

# 近代翻译史中翻译标准“信”的确立

陈 晓 淇

## 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 XIN in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CHEN Xiaoqi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信” (XIN) as one of the criteria in transl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translation history.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Yan Fu’s interpretation of XIN as discussed in *Tianyan Lun*, Lu Xun’s perspective on XIN, and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of “诚” (CHENG), as depicted in the *Yuwai Xiaoshuo Ji*.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chieving formal equivalence, referred to as XIN, translators need to have sufficient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relevant knowledge, while readers must be adequately prepar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in their ability to correspond between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foreign languages. On the contrary, attaining dynamic equivalence, termed CHENG, does not require any linguistic preparation. Yan Fu’s concept of XIN in *Tianyan Lun* emphasizes formal equivalence, while Lu Xun’s notion of CHENG in *Yuwai Xiaoshuo Ji* emphasizes content equivalence. With the expans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debates on translation methodologies, XIN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one of the acknowledged translation standards in China.

Keywords: *Tianyan Lun*, *Yuwai Xiaoshuo Ji*, Yan Fu, Lu Xun, Zhou Zuoren

关键词：《天演论》、《域外小说集》、严复、鲁迅、周作人

在近代中国翻译史中，翻译标准“信”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信”作为近代翻译史中的翻译标准，最先由严复于1898年在《天演论》中提起。在《天演论》的出版版本《译例言》中，“信”位于翻译三难之首：“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 1981:x）。萌生“信”的翻译标准后，严复对《天演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使得其相较于手稿更忠于原文。然而，受限于当时的语言和读者，“信”与“达”无法同时兼顾，《天演论》一书最终选择了以“达”为尚，严复的落款也非“译”<sup>1)</sup>而是“达旨”。

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加，出现了一派支持“信”的翻译者。其中以主张“宁信而不顺”的鲁迅最为瞩目。

---

1) 在《天演论》《自序》中，严复称一书为“译译”。在当时“翻译”一词未广泛使用的情况下“译译”即“翻译”，故而在本文中如未特殊标明，译译与翻译二词不区别使用。

鲁迅自严复《天演论》了解到“信”，在1909年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诚”：“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诚”可视为对“信”的初步实践。

随着近代中国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的增加和围绕“信”和“达”的多次翻译论争，原本被视为对立的“信”和“达”两个标准逐渐兼容。如曾批判过鲁迅的翻译方法、支持“曲译”的翻译者赵景深在后期开始反思起“信”的重要性；批判过鲁迅的翻译方法的梁实秋也在后期承认“信而不顺”与“顺而不信”同样糟糕。

本文旨在梳理上述“信”翻译标准的提起、初步实践和确立的过程。重点分析严复在《天演论》修改中关于“信”的翻译实践及其不可为的原因，以及鲁迅通过《天演论》对“信”的理解和《域外小说集》“诚”的提起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目的与其在“信”被接受过程中的关联性，并对翻译论争中“信”的接受过程进行梳理。

## 一、“信”的提起

“信”的翻译标准最开始出现于严复《天演论》的出版版本。该书序言的首句便阐述了翻译的困难：“译事三难：信、达、雅”，“信”位居首位。严复的“信”不仅是指与原文的神似（即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包括与原文的形似（即与原文的形式保持一致）。然而，《天演论》问世的时期为近代翻译萌芽时期，清末时期占据主流的古文文体的特点和读者的偏好注定了与原文形似的不可为。

### 1.1 《天演论》与“信”的出现

《天演论》的手稿成于1896至1897年间，落款为“侯官严复学”。随后，该书以《天演论悬疏》为名于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连载于《国闻汇编》杂志，落款为“侯官严复述”。1898年以《天演论》为名于慎始斋本出版，落款为“英国赫胥黎造论，侯官严复达旨”。在1901年于富文书局本出版时，落款为“吕增祥署检，赫胥黎天演论，侯官严几道先生述”。回顾该书的成稿历程可以看到，最初手稿中仅标注了“求达”，位于译事三难首位的“信”反而是在《天演论》成稿的最后一次修改（1898年6月10日）中添加。并且，严复的落款不是“译”，而是“达旨”或“述”。

严复所谓的“达”不是指“流畅”、“通畅”，而是指“通达”或是“传达”。《天演论》问世之际，其目标读者虽为当时的精英层读书人，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伦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用本国语言撰写的专业书籍都有一定困难，而试图用异国语言传达自然科学知识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天演论》诞生的时代便注定了其必须“以达为尚”。

1896年的《天演论》手稿仅“求达”，《译例》中还未有“信”的出现，故而可以看到许多将“西人西事”改为“中人中事”的例子。在手稿完成后严复进行了一次小修改，并将译稿寄给吴汝纶请求意见。吴汝纶以晋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为例，提出作为翻译则“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的意见：

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

(严复 1986 : 1560)

受此启发，严复萌生了“信”的翻译理念，在修改中开始试图还原原文的样貌。如在手稿中，严复曾以李广的例子取代赫胥黎《导论·十》中哈曼的例子。在吴汝纶的建议后，严复选择了按照赫胥黎原文翻译，以夹注的形式加上按语点出李广的例子。但该书最终目的还是求达，故而最后在刊本中，严复又将关于李广的文字稍作修改放入正文，将哈曼的文字改入按语（俞政 2002 : 110-11）。参考《天演论》的修改过程也可以看到，修改中有更为忠实于原文的部分，也有反而不忠实于原文的部分。俞政（2001 : 111-117）推测，其原因在于严复修改《天演论》时，主要不是从翻译角度考虑，而是从作文角度出发。故而一手拿着赫胥黎的原著，一手拿着底本译文，互相核对的工作做得比较少；而单单根据底本译文去做篇章结构、思想表达、词句条理等方面的修改工作则比较多。

“雅”同样也是在吴汝纶启发下产生的。在《天演论》的修改过程中，严复还在执笔《原富》的翻译。为《原富》中专有名词的翻译方法，严复曾致信向吴汝纶征询。吴汝纶对严复在其中将 political economics 译为“计学”时所采用的“雅训”译法表示赞同，1898年3月20日与严复的书信中写道：“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严复 1898 : 1562），即《天演论》中“雅”的由来。相较于《天演论》，《原富》的翻译更为准确、完整地传达了原著的中心主旨。然而直到《原富》，“信”仍然不是严复翻译的首要标准。故而《原富》与原著有很大差异，不仅在结构上与原著有所不同，且在内容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削，加入了译者的意见，使得一书与原著在篇幅上不尽相同（皮后锋 2003 : 341-353）。

然而在上述两书中有关“信”与“雅”的关系，对于吴汝纶和严复二人而言有一定的区别。吴汝纶所谓的“信”是在《天演论》中更忠实于赫胥黎原意，“雅”是指《原富》的翻译。严复所谓的“雅”则是为解决“信”标准中无法做到的词汇空缺，即语言不够精密而去典籍中寻找古字以对应而出现的结果<sup>2)</sup>。

综上所述，“信达雅”并非是在《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提出的，而是在1897-1989年间《天演论》的修改过程以及《原富》的翻译过程中得出的。而就严复在《天演论》中的重视顺序来看，“信”、“达”、“雅”应该为“达”、“信”、“雅”。严复之所以将“信”列在首位，是因为对于严复而言，“信”是传达的基础。

## 1.2 “信”的不可为

严复的“信”不仅是指与原文的神似（即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包括与原文的形似（即与原文的形式保持一致）。其证据在于，在《译例言》的第二段中，严复谈到“遥接前文”的“西文句中名物字”是否保留<sup>3)</sup>的两难，即作为形式的英语关系代词是否应该翻译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中英语言形式的不同。

“达”指将意思传达给读者，是面对目标语言的标准。换言之，即使起点语言与目标语言的类型大相径庭，但利用如“改用中人中事”等技巧可以做到“达”。与“达”不同，“信”是面对起点语言内容的标准。“信”可以是最低的标准，即与原文的神似<sup>4)</sup>（传达原文的内容），也可以是最高的标准，即与原文的形

2) 沈国威 2022 : 13.

3)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做此為記，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严复 1981 : xi）。

4) 只顾“神似”的“信”而不顾“达”的情况下，翻译如同解码，目标语言读者或许很难理解解码后的文字。

似（与原文的形式保持一致）。但在《天演论》问世的1898年，无论是与原文的神似，抑或是与原文的形似，都显然是超脱于时代的。

沈国威（2022：9）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的成立需要三方面的准备，即翻译者的准备、读者的准备、语言的准备。其中对翻译者的要求不仅是语言能力，还包括专业能力（即百科知识），即是否能准确地理解原文。如果这三方面地准备没有完成，文章只能“达旨”，而不是“笔译”。在现代，通过辞典编纂和大量的翻译过程（语言准备）和知识普及（读者准备），如果译者有理解外语的能力和该方面的专业知识（译者准备），“翻译”便能够成立，即译本可以兼顾“信”和“达”<sup>5)</sup>。

在晚清时期，近代翻译刚刚萌芽，由一人口述，由另一人执笔写作的“口述笔译”的合作式翻译方法仍占主流。严复依靠熟练的英语能力、文言文能力以及专业知识，可以独立完成翻译，对译文的要求也不再是前人的翻译出大意即可。如《天演论》《译例言》的第二段中提到的英语中的关系代词，严复称“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在此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这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理论中常有的翻译应该“字对字”（形式一致）还是“意对意”（内容一致）（杰里米·芒迪 2014：23）的争执有着类似之处。当时的文言文中还不存在能与英语形式代词对应的“字”，将原文从英语的形式“字对字”地转换为文言文的形式，则“必不可通”，而对形式进行修改（删除关系代词），很有可能丧失形式中蕴含的“意義”。

此外，当时读者对于翻译的期待仅仅是了解外国文化和知识。如与《天演论》同期问世、林纾和王寿昌协作口述笔译方式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仅翻译出了大意，也足以使得洛阳纸贵。即便在《天演论》问世之后的几年内，译者拥有独立翻译的能力，但采取的翻译方法之中，不“信”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依旧占据主流。换言之，即便译者准备已经完成，但语言和读者的准备并没有完成，与原文保持形式一致的翻译无法成立。

故而，在《天演论》中，“信”无法与传达的“达”兼顾，两者甚至是对立的存在：“顧信矣不達，雖訳猶不訳也，則達尚焉”（严复 1981：xi）。为使译本成立，被精英层的读者所接受，《天演论》最终成为了弃“信”取“达”的“译译”。

## 二、“信”的初步实践

自1898年起，懂外语的人逐渐增加，开始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忠实”，其要求超过了将意思传达给读者的“传达”。在这一过程中，最为瞩目的便是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合作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略例》中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sup>6)</sup>的“诚”的翻译观，在晚清翻译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翻译史研究者王宏志指出（1999：193）：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现，确是代表了一个重要改变，甚至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鲁迅确是超越时代的：当大部分译者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法时，他便开始追求忠实的翻译。同为翻译史研究者的陈福康（2002：174）指出，《域外小说集》序言中的“译译亦期弗失

5) 此外，沈国威（2022）对严复的“信、达、雅”有过详细的描述，从汉语和英语的语言类型、汉语本身的缺陷等方面阐释了“信”对于严复的不可为。

6) 会稽周氏兄弟《略例》1909.

文情”表达了周氏兄弟的“直译”观点，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

《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一时，撰写《域外小说集》《略例》的鲁迅，在年轻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本书。从《天演论》的“信”的提起到《域外小说集》的“诚”的实践，鲁迅对严复的态度也出现了改变。

## 2.1 鲁迅与《天演论》

《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一时，年轻的鲁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本书。1898年5月，鲁迅离开杭州前往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了三个多月的试读生被录取后，鲁迅因水师学堂乌烟瘴气（周作人 2002b：31）而转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同年10月被录取。1899年2月，矿路学堂开学，鲁迅通过《地学浅说》初步了解到进化论（周作人 2002b：49）。1901年，俞明震接任矿路学堂的总办，支持维新变法，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矿路学堂也掀起了看新书的风气。鲁迅在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就提到了《天演论》：“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鲁迅《朝花夕拾 琐记》，1981（2）：305-306）。

在这一时期，鲁迅对《天演论》高度推崇，不但很快就将该书介绍给了自己的二弟周作人<sup>7)</sup>，甚至到达背诵的地步（许寿裳 2011：9）。参阅《朝花夕拾》中的记录可以看出，鲁迅购读《天演论》是在1901年后，且购买的是出版的书籍版本而非杂志的连载版本<sup>8)</sup>，那么其版本可能是富文书局的石印本<sup>9)</sup>，《译例言》中存在严复于最后一次修改时添加的“信、达、雅”三字。

对于严复的翻译方法，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称其为“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并坦言自己不懂严复“义法的奥妙”（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2002g：121）。

但在南京时期，鲁迅关注的应该更多在于译文传达的知识而非译文的翻译方法。且这一时期鲁迅未实际从事翻译，受限于期英语能力<sup>10)</sup>和知识的获取途径，可能无暇关注译文忠实与否，也无从得知严复的翻译方法是否“信”，“信”是神似还是形似（即信与原文的内容还是形式）。

## 2.2 鲁迅对严复的扬弃

鲁迅自南京矿路学堂时期开始关注翻译书籍所传递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对于严复的《天演论》、《法意》等书，陈景韩的《仙女缘》、《白云塔》等书，林纾的《茶花女遗事》、《黑太子南征录》等书，都可谓是“随出随买”<sup>11)</sup>，其中鲁迅对于《天演论》甚至到达了可以背诵的地步。

这些新兴近代翻译者的翻译方法对同时代的年轻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周作人就不止一次地坦言

7) “晚大哥（指鲁迅一引者注）忽至，携来赫肯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点钟始睡”（周作人 1996：278）。

8) 可以排除第一章中提到的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连载于《国闻汇编》中的版本。

9) 对于鲁迅阅读《天演论》版本的考证，蒋永国 2018：51-60有着详细的论述。

10) 鲁迅曾在1898年5月起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了约一年时间的英语。但鲁迅未独立根据英语翻译过文章，且再三强调自己不通英语，如“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鲁迅 2005（10）：245），“我不懂英文”（鲁迅200（3）：382）。

11) “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缕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其时‘冷血’的文章正很时新，他所译述的《仙女缘》，《白云塔》我至今还约略记得……未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从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2019：208）。

自己在1906年前翻译小说时曾受过林纾的影响进而选用古文进行翻译<sup>12)</sup>，而鲁迅选择文言文进行翻译，也不乏严复的影响。1902年4月，鲁迅入学东京的弘文学院，乘船前往日本时，还随身携带了《天演论》。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回忆道，在弘文学院之后的仙台时期<sup>13)</sup>，鲁迅还曾通信提到自己在晚上阅读《天演论》(许寿裳 2018: 11)。

留学日本时期是鲁迅大量吸收新知识、并着手翻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历使得鲁迅对严复的态度有了改变。在东京弘文学院时，鲁迅已经开始阅读翻译得比较准确、完整的日译本<sup>14)</sup>，并有《斯巴达之魂》<sup>15)</sup>、《哀尘》等译文问世。其时，鲁迅获取进化论知识的途径也超脱了《地学浅释》和《天演论》这类中国渠道的书籍，拓展至加藤弘之《物竞论》、石川千代松《进化新论》、丘浅次郎《进化论讲话》等日本渠道的书籍。这些书籍拓宽了鲁迅的视野，也使得鲁迅对严复的评价有了变化。

藉由章太炎在1904年发表的《〈社会通论〉商兑》中称严复的译文“申天之势，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许寿裳 2018: 11)为契机，鲁迅对严复的评价变成了“载飞载鸣”：

鲁迅时常称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给他一个轻松的绰号，叫做“不佞”。——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总是很有趣的。后来，我们读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论商兑》，有云：……从此鲁迅对于严氏，不再称“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

(许寿裳《杂谈名人》，2018: 12)

紧接着1906年周作人随着鲁迅来日，两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从事翻译工作，鲁迅也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开始大量阅读英语书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鲁迅意识到自己曾热衷的中文译文中肆意删减之处，渐渐对林译小说<sup>16)</sup>等不忠于原文的译文抱有不满<sup>17)</sup>。后期鲁迅与周作人为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撰写《〈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时，指出了其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的问题，即“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周作人 2009 (1): 516)。而其采取的翻译方法与《天演论》“改用中人中事”的翻译方法也有类似之处。

### 2.3 忠于原文的“诚”的提起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合作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略例》中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任情删

12) 上文脚注中提到，周作人记载自己1909年前关于翻译观的文字，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鲁迅的观点。引证如下：一是“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〇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不少变化”(周作人《空大鼓序》，罗新璋、陈应年(编) 2009: 441)。二是“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地学他”(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2002g: 121)。

13) 即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院就学时期。

14) 马力《鲁迅在弘文学院》，薛绥之(主编) 1982: 21。

15) 鲁迅自身称该作品为“译”：“译者无文，不足拟其万一”(自树 1903: 159)。

16) 鲁迅早期对林译小说非常热心，随出随买，并让周作人寄给他，参考周作人 2002b: 73。

17) 鲁迅对林纾“不谙原文，每遇叙难状之景，任意删去，自然也不以为然”(许寿裳《杂谈名人》2018: 12)。

易，即为不诚”的“诚”的翻译观，在晚清翻译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诚”与“信”在语义中有着类似之处，作为翻译标准使用时其含义也有类似之处，均指对于原文的某种程度的忠实。然而，相较于《天演论》提出的包含形似（与原文保持形式一致）的“信”，《域外小说集》实践的“诚”仅指与原文保持内容一致。

《域外小说集》中的“诚”作为“信”的初步实践而得以成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读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自1898年起，懂外语的人逐渐增加，开始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忠实”，其要求超过了传达意思的“传达”。如20世纪初的《新小说》投稿要求便需附上外语原文以对照，与严复活跃在同一个时期、以“雅”、“达”为翻译特色的林纾，其后期的译文中也出现了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倾向：1901年蟠溪子（杨紫麟）、天笑生（包天笑）翻译的《迦茵小传》仅据原书的后半册翻译<sup>18)</sup>，且费心隐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但1905年问世的林纾、魏易合译的《迦茵小传》不但据全本翻译，并翻译出了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sup>19)</sup>，还原了原文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尽管翻译所使用的主流语言还是文言文，没有做好对应外语的准备，但此时的读者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改头换面的“中人中事”。

《域外小说集》的“诚”的翻译观的提起，不乏鲁迅翻译经验的增加、认识到文学的功用且定下“文学救国”的决心等重要因素的影响<sup>20)</sup>。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生活在日本明治晚期、目睹了明治晚期日本文学翻译界的变化。

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和周作人逐渐树立了忠于原文的意识。鲁迅的首篇译文《哀尘》已是将原文内容完全翻译出来的对译。然而在对译的翻译方法之外，同期的译文中也能看到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之类采取摘译翻译方法，以及如《斯巴达之魂》般无特定底本但称之为翻译的翻译方法。至1909年在《域外小说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会稽周氏兄弟（鲁迅）《略例》，1909）的“诚”的翻译观，两人的翻译方法都出现改变。在《红星佚史》（周作人的第三篇翻译）中周作人首次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陈洪杰、李爱华 2006：101-114），鲁迅也摒弃了无特定底本但称之为翻译的翻译方法。

而这一时期，明治晚期日本文学翻译界的变化，特别是曾以完全的逐词翻译闻名的二叶亭四迷的变化，对鲁迅有着深刻的影响。

明治二十年（1887），二叶亭四迷的作品《あひびき》及《めぐりあひ》问世，两作品是完全忠实于原文形式的译文，曾被评价为“在逐词翻译中也是无可比拟地、无比重视原文的逐词翻译”，“哪怕原文中有数个重复的过去式，都遵照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了”（木村彰 1956：44）。其出现代表着日本文学翻译界产生了质的变化，读者们开始追求符合原文的翻译作品（柳田泉 1966：113）。以完全地忠实于原文而闻名的二叶亭四迷，也自然吸引了鲁迅的注意力：在留学期间，鲁迅收藏的小说中有由二叶亭四迷翻译各种小说<sup>21)</sup>，其中包括果戈里创作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启示（杨佩 1985：28）；鲁

18) “海上蟠溪子所译《迦茵小传》……书佚其前半篇，至以为憾”，据林纾《〈迦茵小传〉小引》，陈平原、夏晓虹（编）1989：154。

19) 寅半生《读〈迦茵小传〉两译本书后》，陈平原、夏晓虹（编）1989：249。

20) 这一部分在笔者论文《何以至“诚”——鲁迅〈域外小说集〉翻译观形成考》（待刊）中有详细讨论。

21) 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迷译，连载于《趣味》第2卷第3号至第5号，1907年3/4/5月发行；《昔人》，二叶亭四迷译，载《早稻田文学》5月之卷，1906年5月发行，据陈漱渝：《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呼声——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13-16页。

迅曾参考二叶亭四迷1908年的译文对《红笑》进行过修改<sup>22)</sup>，而《红笑》是鲁迅拟收录《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短篇小说之一。在留学日本回国之后，鲁迅还曾购买和收藏了东京博文馆出版的缩印版《二叶亭四迷全集》三卷，其中包含二叶亭四迷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1991：271）。

然而以言文一致的文体忠实翻译的二叶亭四迷译文，直至其晚年才被日本的读者所理解，给予应有的地位。期间二叶亭四迷甚至出现牙痛却因没钱而无法就医的情况，故而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之后，二叶亭开始思考其自己翻译作品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我曾想如此将原文的声调挪移过来……不料，（翻译）出来的结果如何呢？我拿起自己的译文，这实在是太难读了，堪称‘佶屈聱牙’”（中村光夫（编）1971：108），二叶亭也曾思考过以“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挥原作的思想”的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但“按茹科夫斯基流进行翻译的话，如果成功了自然风光无比，但如果失败了，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了”。“对于自己的手腕不自信，没法做到这一点”（中村光夫（编）1971：110）的二叶亭最终选择的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删改的翻译方法。

二叶亭四迷翻译方法的这一变化令周氏兄弟感到不满。周作人在回忆1906年学俄文的事情时这么评价：

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这里指周作人和鲁迅一引者注）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

（周作人《学俄文》，2002c：249-250.）

在《域外小说集》的辨言中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原因，或许不仅在于向当时中国的翻译者们宣告“诚”，也不仅在于向《域外小说集》的读者们宣告“诚”，更是在于向试图日本明治时期的翻译家二叶亭四迷宣告“诚”。

相较于1898年的《天演论》提起的形式的“信”，1909年《域外小说集》提起的“诚”仅指内容的等值。尽管《域外小说集》仍与《天演论》一样以古雅的文言文进行翻译，但内容的“诚”得以成立，足以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读者已经发生了变化。

### 三、“信”的确立

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加，以及与批评家进行的关于翻译方法的论争，鲁迅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精密语言的翻译的目，其翻译标准也从“诚”变成了“信”。此后在长达五年的“信”和“顺”的翻译论争中，中国翻译界对于“信”与“达”的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从1898年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发展到了“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的平衡。

#### 3.1 精密语言的“信”

1909年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提出了“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翻译观。“诚”即全部翻译出

22) 鲁迅在修改学生梅川翻译的《红笑》时，根据的就是二叶亭四迷的译本，参考鲁迅 1981（7）：127.

原文内容、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在这之后，两人的翻译观逐渐从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发展至忠实于原文的形式。而在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之前，鲁迅和周作人共享阅读书籍，周作人的很多文章包括译文都经过鲁迅的润色，两人在翻译上的观点也可以互相印证。

在鲁迅为“宁信而不顺”而与梁实秋等人进行翻译论争之前的五四前夕，周氏兄弟便与张寿朋关于译文的“信”和“达”展开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明晰了二人的采取“信”的目的，即弥补中国语言本身的缺点，使语言精密至可以表达使用者细致的思想。

争论的导火索即周作人译诗 Apoipgia 的《题辞》。据周作人回忆，该译诗和题记都曾由鲁迅修改润色过，特别是引起争论的“如果……算不了真翻译”一句是由鲁迅加上去的（周作人《蔡子民二》，2002d：384）：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学了中文自己来做。二，不像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文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糊涂文，算不了真翻译（周作人《古诗今译 Apoipgia》，2009：12）。

周作人提倡的翻译方法引来了张寿朋的批评，他称外国牧歌完全不能这样翻译：“弄得来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其原因在于便是“外国有外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中国有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所以“外国极有精神极有趣味的話，拿来中国却没有精神趣味了。若谙习外国文言的，自然全读外国诗，不用读得译本。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造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费大精神不能”（张寿朋《张寿朋来信》，周作人 2009（2）：82）。周作人于1918年回应道：

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作人《译诗的困难》，周作人 2002e：18-19）。

也就是说，这次争论的明确了周作人对于译作的目标：改头换面的内容的等值已经无法满足这一时期的需求，他期望做到的是与原文做到完全的一致。最好是“逐字译”，即与原文做到“字对字”，这一层次的“信”是严复曾在《天演论》中提到过却未曾做到的。

两年后的1920年，周作人在《译诗的困难》一文中再次提到了诗歌的翻译，在感慨诗是最难翻译的基础上“原作倘是散文，还可以勉强敷衍过去，倘是诗歌，他的价值不完全在于思想，还与调子及气韵很有关系的，那便实在没有法子”，进而谈到其困难原因在于汉语的表达能力亟待提高：

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没有文法的变化，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编制，缺少细致的文词，这便是极大的障碍。讲文学革命的人，如不去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达外来文艺的情调，便是自己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现出来（周作人《译诗的困难》，周作人 2002e：18-19）。

即经过与张寿朋的关于翻译方法的争论，周氏兄弟明确了“信”的目的，即通过与外文形式一致来解决汉语组织不“精密”的问题，以建设可以表达使用者细腻思想的汉语。关于这一点，鲁迅有过更明确的表述：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多；倘将伪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sup>23)</sup>——了，其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鲁迅《〈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鲁迅 1981（4）：329-330）。

汉语无法传达原作的恰当的表述，其原因除译者的能力外，便在于汉语本身的缺点。而为解决汉语本身的缺点，唯一办法只有坚持与原文形式一致的“硬译”，尽管其结果会造成译作的“诘屈枯涩”<sup>24)</sup>。如鲁迅在译文的序言或是后记等地方都明言因为自己的直译：“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sup>25)</sup>；“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sup>26)</sup>；“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sup>27)</sup>等。这一情形与明治二十年代二叶亭四迷以言文一致文体进行完全地逐词翻译，而造成译文“佶屈聱牙”时所面临的困境有着相似之处。

这一为精密语言的“硬译”引来了一部分翻译者的批判。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梁实秋。梁秋实对鲁迅的正式批判始于1930年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其中称鲁迅的译文为“译犹不译”的“死译”，并将曲译置于死译之上。对于鲁迅回应的“中国文法的不完备”<sup>28)</sup>，梁实秋于1932年《论翻译的一封信》中则一口否定，表示与读者是否优秀和中文缺点无关，“硬译”为鲁迅译文之错<sup>29)</sup>。次年梁实秋在《欧化文》中明确对这一文体提出了批评，将矛头指向转译日文的鲁迅：“而鲁迅译起书来（当然是从日本文译）便感觉中国文不够用了，勉强凑和，遂成硬译”<sup>30)</sup>。

然而笔者注意到，鲁迅对硬译的严格坚守仅限于文学理论文字，在小说的翻译之中，其标准则灵活不少。如鲁迅指导许广平翻译《小彼得》时采取的便是采取意译，并在序言中写道：“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sup>31)</sup>。

23) 引用的标点符号据原文，未作改动。

24) 鲁迅《〈艺术论〉译者序》，鲁迅 1981（10）：325。

25)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 1981（10）：169。

26)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 1981（4）：200。

27)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 1981（10）：245。

28)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 1981（4）：199。

29) 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黎照（编）1997：601。

30) 梁实秋：《欧化文》，黎照（编）1997：618。

31) 鲁迅：《〈小彼得〉译本序》，鲁迅 1981（4）：155。

即在这一过程中，鲁迅逐渐有了为读者分类，根据读者调整翻译方法的意识，并明确了自己“硬译”的执行对象：

供给乙（有略能识字的读者—引者注）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有很受了教育的读者—引者注）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鲁迅 1981（4）：391-392）。

### 3.2 “信”与“达”的共存

在激烈的翻译论战之后，支持“达”阵营翻译者的翻译观有了变化。赵景深在题为《鲁迅》文章中说：“他对小说的翻译重‘信’而不十分重‘达’，我则重‘达’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现在他的译文也重‘达’起来，而我也觉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对了，虽然我已经很早就搁下了翻译的笔”（赵景深 1999：2），曾将“曲译”置于“死译”之上的梁实秋，到了1932年也承认“误译、曲译、硬译、死译都是半斤八两”<sup>32)</sup>。

与梁实秋等人的论战也使得鲁迅明确了自己的翻译目的。对翻译论争之后的鲁迅的译文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小说的正文中，鲁迅的译文明显重视起“达”来。于1936年连载于月刊《译文》的鲁迅的《死魂灵》，硬译仅限于理论方面（序言）的文字，正文中则是在亦步亦趋的基础上使它稍加通顺，在一些情况中，甚至有通过表面的“背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忠实的创造性翻译（刘聪 2016：79-84）。

此外，曾支持逐词翻译的周作人在1944年时，也开始将“达”作为翻译标准之一：

自从严幾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周作人《谈翻译》，2002f：41）

从上述坚持“达”的翻译者的反思，和坚持“信”的翻译者的重视“达”的转变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翻译标准的“信”已经被中国翻译界所广泛接受。

32) 梁秋实：《论翻译的一封信》，黎照（编）1997：603。

#### 四、结语

“信”自严复于1899年在《天演论》中提出，指代与原文形式一致。但受限于当时的语言和读者，形式一致的“信”终究不可做到。要实现与原文保持形式一致的“信”，其前提条件是译者、读者和语言三方面都做好充分准备。在1898年，近代翻译刚刚萌芽，掌握外国语言并可以独立翻译的译者较少，由一人口述，由另一人执笔写作的“口述笔译”的合作式翻译方法仍占主流。此外，主流的翻译文体文言文注定无法与外语做到“字对字”的形式面的完全对应。再加上尽管当时的读者为精英群体，但对于翻译的期待仅仅是了解外国文化和知识。换言之，在这一时期，译者、语言、读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这一时期问世的《天演论》注定只能以传达的“达”为主。

此后，随着诸多译者的翻译实践和懂外语的人逐渐增加，读者开始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忠实”。在这一时期，鲁迅主导的《域外小说集》是十分重要的存在。鲁迅自严复的翻译方法了解到“信”这一翻译标准，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在与师长好友的交流中、在所处的明治时期翻译界潜移默化的影响中，逐渐意识到以对内容进行肆意删改的“传达”为尚的翻译方法不可取，进而提出了与内容保持一致的“诚”。“诚”是在语言无法与外国语言进行对应情况下的“信”，也是近代翻译史中“信”的初步实践。

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加，读者群体进一步增加。通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批评家进行的关于翻译方法的论争，鲁迅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精密语言的翻译的目的，其翻译标准也从“诚”变成了“信”。在三十年代长达五年的“信”和“顺”的翻译论争中，中国翻译界对于“信”与“达”的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支持“信”阵营的译者逐渐接纳了“达”的翻译方式，如尽管鲁迅以精密语言为目的坚持尽可能地与原文保持形式一致，但也仅将其运用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文字中，在小说正文的翻译中甚至有通过表面的“背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忠实的创造性翻译出现。换言之，鲁迅逐渐有了为读者分类，根据读者调整翻译方法的意识，并明确了自己“硬译”的执行对象。此外，支持“逐词译”的周作人的翻译方法也变成了“信五分，达三分”。支持“达”阵营的译者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翻译方式，即一味关注“通顺”而造成曲译或是误译是否真的优于“硬译”。这种变化显示出“信”作为翻译标准之一逐渐被广泛接受，翻译界开始认识到“信”与“达”之间的权衡，“信”的地位在翻译界中得到了广泛认可。

#### 参考文献

##### 中文

- 杰里米·芒迪（著），李德凤等（译）（2014）《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第三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1991）《鲁迅藏书研究 鲁迅研究资料增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陈福康（2002）《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平原、夏晓虹（共编）（1989）《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漱渝（2006）《寻求反抗和叫喊的呼声——鲁迅最早接触过哪些域外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0：13-16。
- 会稽周氏兄弟（1909）《域外小说集》东京：神田印刷所。
- 蒋永国（2018）《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考辨——兼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撰述和注释的补正》《鲁迅研究月刊》2：51-60。
- 黎照（编）（1997）《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
- 刘聪（2016）《三重文体交汇的风景——由〈死魂灵〉看鲁迅的翻译策略》《鲁迅研究月刊》9：79-84。

- 罗新璋、陈应年（共编）（2009）《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鲁迅（1981）《鲁迅全集》（1-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皮后锋（2003）《略论〈原富〉的翻译》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341-353。
- 沈国威（2022）《近代翻译史における嚴復の「信达雅」》《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55：3-41。
- 王宏志（1999）《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的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
- 许寿裳（2011）《亡友鲁迅印象记》湖南：岳麓书社。
- （2018）《鲁迅传》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 薛绥之（主编）（1982）《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严复（1981）《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6）《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
- 杨佩（1985）《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介绍鲁迅编定的“小说译丛”》《鲁迅研究动态》4：28。
- 俞政（2001）《关于〈天演论〉译文的修改》《苏州大学学报》3：111-117。
- （2002）《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经过》《苏州大学学报》4：110-111。
- 赵景深（1999）《我与文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周作人（1996）《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
- （2002a）《我的复古的经验》，《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 （2002b）《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2c）《知堂回想录 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2d）《知堂回想录 下》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2e）《谈虎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2f）《苦口甘口》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2g）《雨天的书》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9）《周作人散文全集》（1-14卷）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9）《瓜豆集》，湖南：岳麓书社。
- 自树（鲁迅）（1903）《小说 斯巴达之魂》《浙江潮》5：159-164。

#### 日语

- 木村彰（1956）《二葉亭のツルゲーネフものの翻訳について》，《文学》24（5）：44。
- 陳洪傑、李愛華（2006）《周作人の前期の翻訳活動について》《中国言語文化研究》6：101-114。
- 中村光夫（編）（1971）《二葉亭四迷・嵯峨の屋おむろ集》东京：筑摩書房。
- 柳田泉（1966）《明治初期翻譯文学の研究》东京：春秋社。

